

## 《御选唐宋诗醇》与清代的杜诗接受

孟国栋

**[摘要]** 《御选唐宋诗醇》体现出强烈的“崇杜”倾向,杜诗不仅入选数量为六家之最,更是成为衡量其他五家诗歌的标准。究其原因,固然与杜诗的崇高地位有关,也是此书深受乾隆以“忠孝”论诗观念的影响所致。随着《诗醇》的广泛传播,尤其是乾隆二十二年(1757)科举考试重新加入试律诗以后,它几乎成为各种考试场合的“考试大纲”,杜诗亦因之出现了社会性的接受趋势。主要表现为:一、乡试诗题得句出自杜诗者高居历科之最。二、《诗醇》成为上至翰林院、下至府州县学的必备书目。士子们在考场上和日常备考过程中都在不停地模拟、敷演杜诗,使得清代中后期的杜诗接受呈现出了前所未有的盛况。

**[关键词]** 《御选唐宋诗醇》;杜诗;科举;试律诗;接受史

清代是杜甫诗歌接受史上的高峰时期,其表现形式,除了学界熟知的注本迭出以外,还突出地体现为模拟、敷演杜诗的作品层出不穷。乾隆二十二年(1757),清政府下令在科举考试中重新加入试律诗,中断400多年的试律诗再次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直至光绪二十七年(1901)云、贵五省乡试,清政府共举行了67科乡试,在乡试的试律诗考试中,杜诗受到了极大的重视。笔者曾估算“在清代各省乡试中,杜诗共出现过76次,以杜诗为得句的试律诗曾经有数十万首”。<sup>①</sup>这仅仅是就各省乡试考场上的试律诗创作而言的。士子们为应付科考,在日常备考过程中势必也会不停地以杜诗为得句进行试律诗习作,其数量当远远超过考场上的创作量。可见有清一代,杜诗研习者的人数以及拟作数量都是极为惊人的。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盛况,最大的驱动力当然源自科举考试再度加入试律诗的新规定以及各省乡试频频以杜诗作为得句来源,但堪称科考“大纲”的《御选唐宋诗醇》(以下简称“《诗醇》”),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 一、引言

《诗醇》是梁诗正、钱陈群等人贯彻乾隆皇帝的论诗宗旨,奉其旨意编定的一部诗选。乾隆十五

孟国栋,文学博士,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学者学术发展计划“唐诗的海外传播与接受研究团队”负责人(武汉430072)。本文为武汉大学自主科研项目(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得到“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

<sup>①</sup>参见孟国栋:《科考之助:清代杜诗接受的特殊形态》,《文学评论》2021年第4期。

年(1750)夏全书编成后,乾隆皇帝又亲自撰序加以肯定<sup>①</sup>;乾隆十六年(1751)内务府初刊。全书共47卷,收录李白、杜甫、白居易、韩愈、苏轼和陆游唐宋六大家的诗歌2665首。乾隆二十五年(1760),江苏巡抚陈弘谋认为此书“萃两代之菁英,集诸家之杰作,一经圣主品评,永为千古定论”,于是“恳请重刊通行,以广流布,各省愿刊者陆续刊行,有裨文教”。<sup>②</sup>其后,《诗醇》一再被传抄和翻刻,其版本大致可分为抄本和刻本两大系统。抄本系统,主要有二:一是《四库全书荟要》本,于乾隆四十一年(1776)六月校定完成;一是《四库全书》本,于乾隆四十六年(1781)三月校定完成,即文渊阁本。刻本方面,除内务府初刻本外,另有数种较为重要的版本:(1)陈弘谋奏请重刻内务府本,又衍生出四种常见刻本<sup>③</sup>,这些刻本又陆续被翻刻,扉页通常有“乾隆二十五年岁次庚辰奏明重刊”的署题。(2)浙江巡抚谭钟麟于光绪七年(1881)又奏请摹刻内务府本,由浙江书局刊印,其后的诸种刻本多套印此本。另有光绪三年(1877)公益会刻本、光绪七年江苏书局刻本等。(3)还有未署刊刻时间和刊刻者信息,扉页呈黄色、正中署“御选唐宋诗醇”者。另有无刊刻时间和刊刻者信息,扉页呈黄底、天头和版心各有红色(或黑白)双龙图案、天头署“御选”二字(红色或黑色)、正中署“唐宋诗醇”者,于各版本中最为奇特。(4)清末石印本,如光绪乙未秋(1895)上海鸿文书局石印本、宣统二年(1910)上海书局石印本。民国年间,仍有不少石印本问世,如民国四年(1915)、民国十年(1921)中华图书馆重印本及上海九思斋、鸿文书局石印本等。不仅如此,《诗醇》还广传海外,日本亦曾有翻印陈弘谋奏请重刊本或节选钞本,如日本嘉永五年(1852)刻本、文久二年(1862)刻本、明治十五年(1882)万字堂刻本等。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诗醇》乃古代出版史上一道亮丽的风景,除《诗醇》外,尚未见其他书籍如此频繁地被翻刻,甚至远渡重洋、流播海外。

《诗醇》以其合选“唐宋六大家”(李、杜、白、韩、苏、陆)之诗而颇具特色,成为对清代中后期读书人影响深远的一部重要选本。随着《诗醇》的大量刊刻和广泛流传,书中所选诸家的诗作也广为后人学习和接受,这对于“唐宋六大家”的诗歌,特别是杜诗在清代的接受而言,意义非凡。因为《诗醇》共计47卷2665首,仅杜诗一家即独占10卷722首,占入选诗歌总数的27%和现存杜诗的50%以上,入选数量和比例远远超过其他五家,居于首位。

## 二、《诗醇》中的崇杜倾向

《诗醇》中的杜诗不仅数量多,占比大,还流露出强烈的崇杜倾向。莫砺锋先生曾指出:“在崇唐的前提下,《唐宋诗醇》更鲜明地体现出崇杜的倾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唐宋诗醇》最重要的编选宗旨就是崇尚杜诗。”<sup>④</sup>然而,受研究主题的限定,莫文仅从书中体现出的揄扬杜诗艺术和“在对其他诗人的评价中涉及杜甫”两方面对《诗醇》中的崇杜现象略作说明,并未将论述重点放在崇杜倾向的揭示和杜诗的接受上。实际上,《诗醇》透露出的崇杜倾向远不止于此。

第一,乾隆与编者均将杜诗定为“忠孝”的典范。乾隆主张因人论诗,提出以人品人格定诗品诗

<sup>①</sup>弘历:《御选唐宋诗醇·序》署题“乾隆十五年庚午夏六月既望四日御笔”,梁诗正等编:《御选唐宋诗醇》,光绪七年(1881)浙江书局重刻内务府本,第3a叶。本文所引《诗醇》均据此本,不一一出注。

<sup>②</sup>陈钟珂:《先文恭公年谱》卷一一“乾隆二十五年·三月·奏请重刊《御选唐宋诗醇》”条,《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96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第310—311页。

<sup>③</sup>梁诗正等编:《御选唐宋诗醇》“陈弘谋奏”,《御选唐宋诗醇》,第3a叶。按:署题为“乾隆二十五年岁次庚辰奏请重刊”者,主要有紫阳书院藏版本、书业堂刻本、聚秀堂刻本、两仪堂刻本(双色套印)、珊瑚遗安堂刻本等数种版本,未详何种为陈弘谋奏请重刊时所托。从刻本质量上来看,两仪堂双色套印本字迹最为疏朗;紫阳书院藏版本字行极为紧凑,可能是为了方便学子购买而降低成本的缘故。

<sup>④</sup>莫砺锋:《论〈唐宋诗醇〉的编选宗旨与诗学思想》,《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03年第3期。

格：“诗文岂空言，尚论知其人。”<sup>①</sup>乾隆在他的文集中一再强调杜甫乃忠厚之人<sup>②</sup>，将杜甫打造成了“忠孝论”的典型，“抒忠悃之心，抱刚正之气”的杜诗正是用以展现其“忠悃”的载体，故而亦厥品甚高。

乾隆还通过“杜甫诗·小序”，在《诗醇》中大谈特谈杜甫的“忠孝”观念：“昔圣人示学诗之益，而举要惟事父事君……古之人一吟一咏，恒必有关于国家之故，而藉以自写其忠孝之诚……夫子美以疏逖小臣，旋起旋蹶，间关寇乱，漂泊远游，至于负薪拾椘，舖糒不给，而忠君爱国之切，长歌当哭，情见乎词。是岂特善陈时事，足征诗史已哉？东坡信其‘自许稷契’，或者有激而然，至谓其‘一饭未尝忘君’，发于情，止于忠孝。诗家者流，断以是为称首。呜呼，此真子美之所以独有千古者矣！予曩在书窗，尝序其集，以为原本忠孝，得性情之正，良足承《三百篇》坠绪。兹复订唐宋六家诗选，首录其集而备论之，匪唯赏味其诗，亦藉以为诗教云。”<sup>③</sup>

杜甫身当乱离之际，冲破安史叛军的封锁，奔赴唐肃宗所在的风翔，颇受皇帝嘉赏，后虽漂泊西南，但仍深怀忠悃之心。乾隆许之为“忠君爱国”“止于忠孝”“原本忠孝”，从生活时代、社会状况和人生际遇等多个方面高度赞扬了杜甫的品性。后来，杜甫更是被乾隆认为“品高万古孰同其，一生惟是忠孝耳”<sup>④</sup>，“忠孝”一再被拈出，杜诗亦被当作“原本忠孝，得性情之正”的典范，堪称千古诗家之首。

受乾隆的影响，《诗醇》的编选者也为杜诗贴上了“忠爱”“忠孝”等标签。如认为《哀江头》：“纯是忠爱之情，忧戚之志”；《北征》：“结恋行在，望匡复言，有伦脊忠爱见矣”；《奉送郭中丞兼太仆卿充陇右节度使三十韵》：“言有伦脊，义归忠爱”。一些“怨而不露”之诗，亦被编者视为他人难以企及的“忠孝”之作。如《恨别》被认为是杜甫在流离漂泊、衣食不暇之际，依然关心国事之作，其诗语更是“发乎性、止乎忠孝”，“寻常词章之士，岂能望其项背哉”；《对雨》亦被评为：“感时忧国，触绪即来，非忠义根于至性者不可强为，所以独冠千古而上继《骚》《雅》。”甚至有曲为杜甫回护之处，“三吏”“三别”纵然因杜甫心怀民间疾苦而在言辞间略带讥讽，编者依然认为“当在变风之列”；《秋兴八首》被誉为“拳拳忠爱，发乎至情，有溢于语言文字之表者哉”；《诸将五首》则引黄生之评语曰：“大旨在于忠君报国、休兵恤民、安边而弭乱。其老谋硕画，款款披陈，纯是至诚血性语。”

可见，无论帝王还是编者都在《诗醇》中不遗余力地推崇杜诗。杜甫已被塑造为“忠孝”的代表，其诗歌自然也就成了“原本忠孝”的典范。《诗醇》的编者一方面执行乾隆“以忠孝论诗”的诗歌主张而希冀深契帝心，另一方面也希望以此来模范士林。

第二，所选杜诗的主题与内容既丰富又灵活。《诗醇》所选杜诗在体裁、内容和风格方面均极具代表性。大凡杜甫的经典诗篇，无论古体还是律绝、长篇还是短制，也不论主题抑或风格，基本上都被选入。即使是被乾隆认为“意主讽刺，而非温柔敦厚之遗矣”<sup>⑤</sup>的作品，如《兵车行》“三吏”“三别”等，梁诗正等人也悉数揽入，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兵车行》乃“《小雅》遗音也”；《新婚别》“与《风》《雅》何以异”；《垂老别》“义合《风》《雅》，不为诽谤耳”（引胡夏客语）；《新安吏》诸篇，上继《风》《雅》，即使“孔子删诗”，它们也“当在变雅之列”。但其他五位诗人则无此殊遇。如在陆游诗歌的选取上，梁诗正就颇为犯难地指出“较难断以风人之义”，而主要收录了一些描写

<sup>①</sup>弘历：《御制诗初集》卷二一，《清代诗文集汇编》编纂委员会：《清代诗文集汇编》第319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346页。

<sup>②</sup>如“杜陵忠厚人”、“其于忠君爱国，如饥之食、渴之饮，须臾离而不能”等等。

<sup>③</sup>按：此“小序”非编选者语，应为乾隆所写。参见陈圣争：《〈唐宋诗醇〉的选评宗旨及诗学思想新探》，《中国韵文学刊》2018年第2期。

<sup>④</sup>弘历：《御制诗四集》卷九六，《清代诗文集汇编》编纂委员会：《清代诗文集汇编》第326册，第597页。

<sup>⑤</sup>弘历：《御制诗四集》卷三〇，《清代诗文集汇编》编纂委员会：《清代诗文集汇编》第325册，第276页。

日常生活或民族意识不太浓厚、感情不甚激越的爱国类诗歌,还要将其打上“忠贞爱国”的标签“驯化”入选,如认为《观大散关图有感》“忠愤蟠郁”,《示儿》像杜甫一样深怀忠悃之心:“此其用心,与子美何以异哉!”

第三,以杜诗作为衡量其他五家诗歌的标尺。除将杜诗打造为“忠孝”的典范以外,编者也将“忠孝”作为评价其他几位诗人的标准,大致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以忠君爱国等“忠孝”观念衡量其他诗人,特别是李白与陆游。编者在小传中指出李白的诗亦有“致其忠爱之志”处,“其根于性情,而笃于君上”,评价其《远别离》为:“忠诚不懈如此,此立言之本指。”评《长相思》曰:“贤者穷于不遇而不敢忘君,斯忠厚之旨也。”对于陆游的诗歌,编者曾为难地说到“六家诗集中,白、陆最大别择,较难断以风人之义”,但最终还是通过“忠孝”论将其驯化,向杜甫靠拢。编者不仅在小传中认为陆游之生平与杜甫类似:“在蜀之日,颇多其感激悲愤、忠君爱国之诚,一寓于诗。”在具体诗歌的评价上,亦一再从“忠”的层面指出陆诗得杜甫真传。如评《送七兄赴扬州帅幕》曰:“但觉忠愤填胸,不复论其造句之警,此子美嫡嗣。”评《曳策》云:“触绪即来,自是此翁忠悃,与杜陵无二。”另有多处亦用“忠愤”“忠厚”“忠义”等语以评其诗。其次,提出其他诸家诗作存在模仿、化用和借鉴杜诗的痕迹,如认为白居易《小童薛阳陶吹觱栗歌》“全是摹老杜观舞剑器行而变化出之”、《寄献北都留守裴令公》乃“杜甫嗣音”;苏轼《石鼓歌》亦“起仿《北征》诗体……驰骤中章法乃极严谨,真足嗣响少陵”;陆游《游三井观》“妙得子美家法”、《山行》“不失子美家法”,等等。最后,认为其他五家诗作有可与杜诗类比之处,如“直逼子美堂奥”(白居易《画竹歌》)、“直逼杜陵”(韩愈《晋公破贼回重拜台司……》)、“差肩杜老”(苏轼《同王胜之游蒋山》)、“颀颀杜老”(苏轼《舟行至清远县……》)、“匹敌杜陵”(苏轼《欧阳少师令赋所蓄石屏》)等。此外,诸如“似”“神似”“仿佛”等评语更比比皆是。实际上,此类评语多从构思、笔力、风格、境界等角度着眼,大都与杜诗并无直接关联,编者却将其与杜诗类比,更显示出他们刻意将杜诗作为衡量其他五家诗歌标尺的评价标准。

### 三、作为考试“大纲”的《诗醇》

《诗醇》一经刊刻,即入藏翰林院,成为翰林学士的重要阅读书目。乾隆年间的戴第元在翰林院时即经常阅读《诗醇》,并给予了高度评价。他在《唐宋诗本·自序》中说:“《御选唐宋诗醇》一书,至博至精,津梁奕禩。所选者六家,而三唐两宋之精华无不荟萃。第元官翰林时,诵习既久,玉堂清暇,泛览滋多。”<sup>①</sup>曾为翰林院教习的彭元瑞也认为要想成为合格的翰林学士:“应将《文选》及《唐宋诗醇》《文醇》尽卷熟读。”<sup>②</sup>其后也有官员感慨:“恭读《御选唐宋诗醇》,如杜之激昂、韩之倔奇、李、苏之纵肆,咸登于集,为天下之式,并非专取白、陆两家平易近人之作,盖其大旨深合诗教。”<sup>③</sup>可见《诗醇》在高层文士心目中有着较为崇高的地位,从某种程度上有力地推动了读书人对六大家的接受,书中占比最重的杜甫亦不在话下。

不仅如此,《诗醇》还凭借其强劲的实用性,备受士人青睐,最突出地表现在科举考试与书院教育领域。自乾隆二十二年清廷下令再度将试律诗加入科举考试中以后,通过不同规定,将试律诗运用到了不同考试场合,不仅成为各省乡试的必考科目,学子的日常窗课,童生岁科二试,各贡生考试,翰詹、考差之试,甚至连臣工应制、考官拟作以及巡幸献诗等,均离不开试律诗。按照规定,这些考试尤其是乡、会试中的试律诗,标准体式通常为五言八韵排律(童试为五言六韵):“诗题应正书‘赋得某

<sup>①</sup>戴第元:《唐宋诗本》卷首,清览珠堂刻本(本衙藏版),第1a叶。

<sup>②</sup>英和:《思福堂笔记》卷下,《续修四库全书》编委会:《续修四库全书》第1178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555页。

<sup>③</sup>董沛:《汝东判语》卷六,光绪正谊堂全集本,第4叶。

句’，旁注‘得某字五言八韵’，遗漏舛错者议处。”<sup>①</sup>即诗题格式应为“赋得某句<sub>得某字五言八韵</sub>”。所谓“赋得某句”，即试律诗的诗题得句，出处有明确规定：“或用经、史、子、集语，或用前人诗句。”<sup>②</sup>不仅如此，这些得句还须以冠冕为尚，“太琐褻者不称体裁”。<sup>③</sup>科举考试的诗题得句广涉四部典籍，考官命题的时间又极为短促，根本来不及遍检群书。<sup>④</sup>即以“前人诗句”而言，各地贡院也无法备足历代诗人的别集以供考官查阅。在这种形势下，类似于考试大纲或参考书目的选本受到了命题者的追捧，特别是带有“御纂”“钦定”一类的选本，《诗醇》更是受到了特别的重视。

陈弘谋奏请重新刊刻内府本《诗醇》时，将其抬升到了乡、会试试律诗“诗学之根柢”的高度：“我皇上特命乡会场增试排律一首，天下士无不诵习声诗，和声鸣盛。而诸生平日讲肄诗律者甚少……《唐人试帖》《近光集》等书……未足为诗学之根柢。伏读《御选唐宋诗醇》，萃两代之菁英，集诸家之杰作，一经圣主品评，永为千古定论。”<sup>⑤</sup>据《科场条例》记载，乾隆二十七年以后，包括《诗醇》在内的数十种“御纂”类图书成为乡、会试的必备书籍，以供考官命题发策之用：“乾隆二十七年奉上谕：‘闈中旧存书籍，残缺不完，试官每移取坊间刻本，大半鲁鱼亥豕，自命题发策以及考信订讹，迄无裨益。应将乡、会两试需用各书，汇列清单，就武英殿请领内府官本，钤用该衙门印信，备贮应用。’”<sup>⑥</sup>

因此，包括《诗醇》在内的“御纂”“御选”类图书均有颁发之举，以便学子诵读：“御纂诸书，颁发各直省，依式刻板流传，并分给各学，存储尊经阁，俾士子咸资诵习。”<sup>⑦</sup>于是全国各地学宫中大都藏有《诗醇》<sup>⑧</sup>。不过内府官本毕竟有限，无法供给全国所有的学宫和书院，因此清政府也允许各地的书坊贾肆刊印“御纂”之类的书籍：“御纂诸书……书坊贾肆愿行刊印者，听其颁行各省者。”<sup>⑨</sup>《诗醇》之所以会出现如此多的版本，也就不难理解了。

科举考试中的试律诗得句为何多出自《诗醇》呢？第一，《诗醇》的卷帙篇幅比较适中。书中所收六家诗作也较合理，各家的精华之作几乎全被收入。即以杜甫而言，全书共收录杜诗722首，占全部杜诗的半数以上，且各体兼备，以之为基础寻找诗题得句，可收事半功倍之效。第二，较为容易获取。《诗醇》多由政府颁发，翰林院、贡院和各府县学宫和书院大都藏有此书，考官取阅极为便利。各类总集和文人别集并无颁贮之举，各地书院也未必悉数置办。第三，命题时间短促。乡试题目大都由正、副考官商定，考官一般都在考前数日方抵达贡院，考题需要在很短的时间内确定，还要为发刻、印制试卷预留时间。加之试律诗仅是乡试中的一道试题，重要性稍逊，考官们在命题时往往遵循快捷、方便之原则。诗题得句若源自“萃两代之菁英，集诸家之杰作”，又“经圣主品评”的著作，诗题不当或不称题的风险均可规避，《诗醇》自然也就成为了他们命题时的首选。李慈铭在日记中记录了依据《诗醇》命题的详情：“同治初元以来，殿廷考试，命大臣拟题，内出书一卷，折角数叶为记，拟者即数

① 昆冈等：《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三三一，《续修四库全书》编委会：《续修四库全书》第803册，第291页。

② 商衍鎏：《清代科举考试述录及有关著作》，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第263页。

③ 蒋义彬：《词馆试律清华集·凡例》，道光四年（1824）刻本，第1a叶。

④ 曾充任同治三年（1864）顺天乡试副考官的李棠阶在日记中记下了其参与命题的详情，对我们了解命题过程较有帮助：“初六日，入直如昨。奉命充顺天乡试副考官，即行收拾入闈……初八日，辰刻恭接颁来折角《大学》《论语》《孟子》《斯文精粹》《诗》各一本，照拟题目，公同，题商定……赋得‘一洗万古凡马空’得龙字。请房考四位写题目，已刻写完，即于堂上发刻毕，即于申初刷印，亥刻完。开门发出。”从辰刻接书，到巳刻写完，也不过一个时辰，命题时间之短促由此可见。李棠阶：《李文清公日记》，长沙：岳麓书社，2010年，第1074—1075页。

⑤ 陈钟珂：《先文恭公年谱》卷一一“乾隆二十五年·三月·奏请重刊《御选唐宋诗醇》”条，《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96册，第310—311页。

⑥ 杜受田修、英汇纂：《科场条例》卷四三，咸丰二年（1852）刻本，第4b叶。

⑦ 杜受田修、英汇纂：《科场条例》卷四三，第5a叶。

⑧ 即使是僻处云南的顺宁府（凤山书院）、镇南州（龙川书院）和楚雄县县学中均藏有《诗醇》，详参孟国栋、陈圣争：《从选本到教材：〈唐宋诗醇〉的经典化之旅》所附“方志所载各府州县学宫、书院藏《诗醇》简表”，《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7期。

⑨ 允禔等：《钦定大清会典》卷三二，《续修四库全书》编委会：《续修四库全书》第794册，第293页。

叶中择之,其诗题字出于《唐宋诗醇》。”<sup>①</sup>晚清名臣翁同龢多次奉派担任各类考试的正、副主考官,对此亦多有记载,如光绪二年(1876)四月十八日,翁同龢奉派拟庶常馆散馆试题,到南书房后,“发下《赋汇目录》一本,《唐宋诗醇》一册”。<sup>②</sup>

因乡试试律诗得句往往源自《诗醇》,各书院在日常训练中也极为重视该书。早在乾隆二十三年(1758),亦即清廷下令在科举考试中新增试律诗的第二年,时任太仓娄东书院山长的沈起元即敏锐地指出写作试律诗不仅需要了解唐人名家诗,更要泛读各家文集:“现奉新纶,(试律诗)已入功令,则此艺尤不可不讲。初学入门,宜先读中唐诸公,次读李、杜,次读昌黎,次读王、孟、韦、柳,而温、李、元、白以次而及……下及欧、苏及元明诸公。”<sup>③</sup>虽然此时《诗醇》尚未被提升到科举考试“大纲”的高度,但书中所收李、杜、韩、白、苏五家早已被沈起元规定为娄东书院学生们的参考书目。道光二十七年(1847)七月,龙启瑞出任湖北学政,他在《到任告示》中即再三告诫湖北学子要重视《诗醇》:“唐宋佳什,杜、韩、苏、黄诸大家全集,能涉猎更佳。其选本则谨奉钦定《唐宋诗醇》作圭臬足矣。”<sup>④</sup>可见在应考过程中,《诗醇》的确发挥着重要作用,无论是熟悉诗题出处,还是揣摩诗艺,作为选本的《诗醇》起到的效果更佳。

有条件的家庭也往往会购买《诗醇》,以供后辈应举和作诗时参考。周作人曾回忆:“戊戌(1898)前后,介孚公(按:即其祖父周福清)把一部木版钦定《唐宋诗醇》寄回家中。”<sup>⑤</sup>同时还告诫周氏兄弟学诗之取法,这对于幼龄的鲁迅、周作人来说,自有其指导作用。与其他读书人一样,周作人自幼即进行试律诗习作,常以《诗醇》中的诗歌作为得句,最多的即是杜诗<sup>⑥</sup>,另有以苏轼、陆游之诗为题者,如“诗中定合爱陶潜<sub>得潜字</sub>”(苏轼《听武道士弹贺若》)、“远闻佳士辄心许<sub>得佳字</sub>”(陆游诗)。<sup>⑦</sup>不仅需要应考的士子如此,一些女子甚至也自幼即研习《诗醇》。清朝中期的女诗人高顺贞五六岁时即从其父兄问字:“读《毛诗》《女诫》及《唐宋诗醇》,略皆上口。继取其家所藏诸名家诗集,便加翻阅。”<sup>⑧</sup>其父高寄泉为嘉庆二十三年(1818)举人,家中藏有《诗醇》,其备考过程中对此应该多有参阅,故而其女自幼亦得以饱览此书。这正说明《诗醇》作为科举考试“大纲”和日常学诗“教材”的观念日渐深入人心。

#### 四、科举考试视域下的杜诗接受

在《诗醇》日益成为科举考试“大纲”的情况下,书中所收的杜诗也频繁地出现在遍及全国17个省份的乡试之中。从乾隆二十二年至光绪二十七年,清政府共举行67科乡试,从诗题得句来看,杜诗大量出现在乡试诗题中。据统计,这67科乡试共有诗题1044道,其中有50科出现以杜诗为诗题得句者,共76题,在前人诗句中独占鳌头。这76题杜诗得句有61题可从《诗醇》中直接检得,剩余15题中的7题亦见于《诗醇》,只是略有变化。实际上,由于诗题的重复,溢出《诗醇》的杜诗仅有8句。嘉庆六年(1801)至光绪十二年(1885)举行的宗室乡、会试,得句源自杜诗者共有4题,其中3题

<sup>①</sup>李慈铭:《桃花圣解盒日记》丁集第二集“光绪二年七月二十四日”条,李慈铭:《越缙堂日记》,扬州:广陵书社,2004年,第7083页。

<sup>②</sup>翁同龢著,翁万戈编:《翁同龢日记》,上海:中西书局,2012年,第1239页。

<sup>③</sup>王祖俞:《民国太仓州志》卷九“学校下·娄东书院”附“院长沈起元教规”条,民国八年(1919)刊本,第6a叶。

<sup>④</sup>龙启瑞著,吕斌编著:《龙启瑞诗文集校笺》,长沙:岳麓书社,2008年,第517页。

<sup>⑤</sup>仲密(周作人):《〈唐宋诗醇〉与鲁迅旧诗》,鲁迅研究室:《鲁迅研究资料》3,北京:文物出版社,1979年,第293页。

<sup>⑥</sup>据周作人日记记载,时为生童的周作人在1900至1901年间曾五次以杜诗为题进行试律诗创作,如“闻道长安似弈棋得安字”“二三豪俊为时出得时字”等,详参孟国栋:《科考之助:清代杜诗接受的特殊形态》。

<sup>⑦</sup>按:以上所引周作人律诗诗题得句,皆见之于《周作人日记》相关日期记载,《周作人日记》(影印本),郑州:大象出版社,1996年。

<sup>⑧</sup>滕绍周等:《民国迁安县志》卷一六,民国二十年(1931)铅印本,第2b叶。

见于《诗醇》。《诗醇》所收杜诗在科举考试中出现的频率之高可见一斑。试律诗最基本的要求就是“依题写作”，清代乡试诗题得句中大量出现杜句，势必要求考生对杜诗极为熟悉，否则一切皆无从谈起，这也从客观上促成了士子们对杜诗在接受。

道光二十九年(1849)己酉科四川乡试诗题为“赋得每依北斗望京华<sup>得心字五言八韵</sup>”，得句源自杜甫的《秋兴八首》(见收于《诗醇》卷一七)。本年四川境内有8800余名士子参加乡试，“得士如额”——即取中举人60名，副榜12名，录取比例不足1%。也就是说1849年仅四川一省就有8800多人必须以该句杜诗为题创作了8000余首试律诗。而本年广西、云南两省的乡试诗题亦源自杜诗，可见这一年，仅在乡试的考场上就有数万首以杜诗为题的试律诗被创作了出来，数量极为可观。

科举考试过程中，士子们又是如何在考场上敷衍和接受杜诗的呢？我们以道光二十九年四川乡试中的两首试律诗为例略作分析。

其一为：

赋得每依北斗望京华<sup>得心字五言八韵</sup> 王庚 第1名 夔州府巫山县

夔府清秋夜，京华望不禁。迢遥千里目，依恋一片心。北斗高常指，西方远可寻。七星光炯炯，双阙气森森。星汉纵横簇，山河拱卫深。寄身忘地角，翘首倚城阴。历井扞参路，瞻云就日忱。天颜原咫尺，葵向遍儒林。

考试官龚自闾批：清新俊逸。考试官赵昉批：玉节金和。<sup>①</sup>

其二为：

赋得每依北斗望京华<sup>得心字五言八韵</sup> 张启辰 第11名 叙州府宜宾县

一别京华去，依依直到今。西川悬望眼，北斗系遐心。魏阙兼天远，觚棱带月沉。人犹羁旅滞，路是广寒深。玉宇三千迥，巫峰十二阴。沧江惊晚岁，身世托长吟。听钥怀青锁，凭栏写素襟。龙光瞻咫尺，葵藿共摅忱。

衡文堂原批：不事雕琢，自饶神韵。眉批：一片神行。沉郁顿挫，蕴藉风流。

本房加批：嵇琴阮啸，寄托遥深，学杜而得其神似者。

本房总批：韵语摩刘垒之坚，秦城树帜。<sup>②</sup>

考官和阅卷官对此二诗的评价都较高，作者也都取得了较好的名次，王庚更是成为此科乡试解元。王诗首句破题，点明时令和地点，与杜诗颇为契合，其后以至第七联，都紧扣“望京华”展开，对于“望”字的描摹尤其入微。三、四、五联在“望”字上又围绕“北斗”腾挪闪移、变化出之。第六、七联则回归到杜甫的处境，即便身在地角(蜀地)，依然心“望”京华，并用云彩环日、葵藿倾阳的典故表明心迹。末句既是杜甫的心迹，也是作者本人的心声，希望能得瞻天颜。张诗首联点明离别京城的状态，三、四、五联在“倚北斗”而“望”时突出“月”字，第六、七联则回到杜甫的襟怀。最后一联与王诗类似，以“颂圣”作结。比较而言，张诗略“隔”，尤其是“月”的出现频率较高，有点喧宾(月)夺主(北斗)了。不过“本房加批”认为该诗“学杜而得其神似”，应该源于张诗在句式上多有模仿杜诗之处，如“兼天远”，仿杜诗“兼天涌”，“路是广寒深”句，模仿杜诗“月是故乡明”，“沧江惊晚岁”更是直接截断杜诗原句“一卧沧江惊岁晚”而成。

由此可见，当杜诗出现在科举考试过程中时，考生首先需要知道诗题得句的出处，如该科第2名聂铃之诗首句即点题说“杜老诗怀壮”。其次要选择诗题得句的某个甚至几个角度进行敷衍。其后的几联更是需要围绕杜诗原意以深入挖掘。因此当杜诗高频率地出现在各地乡试中时，自然引起士

<sup>①</sup>此诗据《道光二十九年己酉科四川乡试录》辑录，第31叶。

<sup>②</sup>此诗据《道光己酉科四川乡试殊卷·张启辰》辑录，第7叶。

子们的重视,在日常读书过程中已熟谙杜诗的一些经典诗作或诗句。

在备考过程中,无论书院的掌教还是各个层级的读书人都极为重视这方面的训练。广州羊城书院院长谢兰生即在日记中详细记录了命生监和童子以杜诗为得句作为日课的情形,如嘉庆二十四年(1819)三月二十八日,“课期:‘赋得清言(谈)玉露繁’得‘清’字”。<sup>①</sup>“五月二十九日,课期:‘赋得峡云笼树小’得‘笼’字”。<sup>②</sup>道光二年(1822)五月二十四日,“本日生监课题:‘赋得峡云笼树小’得‘笼’字”。<sup>③</sup>道光三年(1823)十月初九,“生监课题……‘赋得下笔如有神’得‘书’字”。<sup>④</sup>道光六年(1826)七月初二,“文童题:‘发愤忘食’、‘赋得一洗万古凡马空’得‘空’字”。<sup>⑤</sup>曾获光绪十四年(1888)浙江乡试第十名的陈汉章,自幼即以杜诗为得句进行试律诗创作。如同治十三年(1874),年仅11岁的陈汉章,即大量进行这方面的训练,至今仍有《赋得攀桂仰天高》《赋得冬至日初长》《赋得蛟龙得云雨》《赋得三月三日天气新》《赋得黄知橘柚来》等多首存世。此后陈汉章每年都有类似习作,存世者尚有12岁时所作《赋得春泥百草生》《赋得一览众山小》《赋得开轩纳晚凉》;13岁时所作《赋得攀桂仰天高》《赋得竹深留客处》;14岁时所作《赋得春寒花较迟》《赋得名园依绿水》《赋得月涌大江流》等等。陈汉章有时还会反复针对某一句杜诗进行训练,如光绪八年(1882)五月,他作有《赋得香罗叠雪轻》,后又重作《赋得香罗叠雪轻》<sup>⑥</sup>,其对以杜诗为得句的试律诗之重视程度不难想见。

## 五、余 论

杜诗在后世的接受是学界颇为关注的话题,相关研究成果层出不穷,如果我们将视野扩大到科举考试领域,则会发现杜诗接受的新天地。

科举考试在清代杜诗接受中所起的作用,之所以较少被人提及,既与研究者关注视角的缺失有关,也与对科举资料的忽视相联。实际上,清代的科举考试对杜诗接受的推动,并不亚于仅仅依靠阅读各类杜集的注、评、钞本。《诗醇》在此过程中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它既是“崇杜”思潮的推手,成为帝王和编者扬杜的窗口,又是科举考试的“大纲”,促使天下读书人广泛地阅读和接受杜诗。

《诗醇》中之所以集中而频繁地出现“崇杜”倾向,与其产生背景和选诗宗旨有关。我们认为这是乾隆以“忠孝”论诗的直接结果,杜甫被树立为“得性情之正”的典范,梁诗正等人在编选《诗醇》时,自然会贯彻皇帝的旨意,突出杜诗的作用,不仅“首录其集而备论之”,更是将其当作衡量其他诸家的标尺。

科举考试诗题中高频率地以杜诗为得句,无疑将《诗醇》中的“崇杜”思潮推广到了全部读书人身上,但凡参加科举考试的读书人都“被迫”熟谙杜诗。在广泛地使用和学习下,《诗醇》的地位和影响力固然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清代中后期的杜诗接受也呈现出了别样的状态。

(责任编辑:张 升)

<sup>①</sup>谢兰生:《常惺惺斋日记》,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7页。按:诗题源自杜甫的《赠虞十五司马》。

<sup>②</sup>谢兰生:《常惺惺斋日记》,第11页。按:诗题源自杜甫的《送段功曹归广州》。

<sup>③</sup>谢兰生:《常惺惺斋日记》,第94页。

<sup>④</sup>谢兰生:《常惺惺斋日记》,第132页。按:诗题源自杜甫的《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

<sup>⑤</sup>谢兰生:《常惺惺斋日记》,第215页。按:诗题源自杜甫的《丹青引赠曹将军霸》。

<sup>⑥</sup>钱英才:《国学大师陈汉章》,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7年,第354—363页。

## *Yuxuan Tang Song Shichun* and the Reception of Du Fu's

### Poetry in the Qing Dynasty

MENG Guodong

**Abstract:** *Yuxuan Tang Song Shichun* 御选唐宋诗醇 (*The Imperial Collection of Tang and Song Poetry*) reflects a strong inclination towards exalting Du Fu's poetry. Du Fu's poems not only dominate in terms of the number of selections, but they also serve as the benchmark for evaluating the works of the other five poets included in the collection. This phenomenon is partly due to the high esteem in which Du Fu's poetry is held and is also influenced by Emperor Qianlong's view of poetry through the lens of "loyalty and filial piety". With the widespread dissemination of the collection, especially after *lüshi* 律诗 (regulated verse poetry) was reintroduced into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in 1757 (the 22nd year of Qianlong's reign), this collection effectively became the "syllabus" for various examinations. This led to a societal trend of reception of Du Fu's poetry. This trend is primarily manifested in two ways: first, the highest number of poetry topics in provincial exams were derived from Du Fu's verses; second, this collection became an essential text from the Hanlin Academy down to local prefectural and county schools. Scholars continuously emulated and elaborated on Du Fu's poetry in both examinations and daily preparation, resulting in an unprecedented flourishing of the reception of Du Fu's poetry in the mid-to-late Qing Dynasty.

**Keywords:** *Yuxuan Tang Song Shichun*; Du Fu's poetry; imperial examination; regulated verse poetry examination; reception history

**About the author:** MENG Guodong, PhD in Literature, is Professor and PhD Supervisor at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